

福建

十年民俗调查

周立方／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福建

十年民俗调查

周立方／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建十年民俗调查/周立方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5615-2119-9

I. 福… II. 周… III. 民俗-研究-福建省 IV. K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8251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地址:厦门集美石鼓路9号 邮编:361021)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16 印张:19.25 插页:6

字数:320千字 印数:1~1000册

定价:3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一

许怀中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有一段难忘的岁月，但因人而异。如果一个人难忘的是不为名利写作而有成果的时光，就不能不说他是“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是他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的体现。周立方同志就把他集中写作的十年看成是难忘的岁月。

这本文集，收录了立方同志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十年间撰写的二十多万字文章，取名为《福建十年民俗调查》。

我和立方同志是校友又是多年的同事，对他的为人和为文，是比较了解的。我于厦门解放后进入厦门大学中文系就读，立方解放前便在该系从事地下活动，因革命需要，没有读完就离开了厦大，我们无缘会面。他在闽粤赣边区闽南地委机关工作，打游击，迎来福建的解放。先后在漳州地委漳州日报社、建阳地委闽北人民报社工作，一度调到县里负责宣传工作。1955年调到省委党校。1977年到省委宣传部，我于1983年从厦大调到部里，他已是理论处老处长。有一段时间，我也分管理论工作，和他同事。1985年，他调任省社科联秘书长，1990年8月离休。1991年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后，我们先后到研究会担负社会工作，他一直当研究会的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至今。在这期间，他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但为配合吕良弼主任组织学术研讨及编书工作，花去大量时间。

叙述老周的这段经历，是为了说明，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所撰写的理论文章和他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组织工作分不开。无论在宣传部、省社科联或离休后到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立方同志主要都在理论部

门。他工作认真负责,不顾体弱多病,经常为组织学术论文、审阅论文、开好学术研讨会废寝忘食。这十年来,他撰写调查报告、论文,都是出于工作需要,出于改革开放以来时代的需要。

从周立方同志的这些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深入调查、联系实际的务实作风。本书《自序》已详细说明这些文章的写作缘由和意义,读者可以从了解他的研究课题和写作历程。大体而言,书中选录的二十多篇文章,可分为两类,论文和调查报告。论文,如《朱熹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弘扬空海潜心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的崇高精神》、《妈祖研究的学术意义》;调查报告,如《大岵男女劳动分工及妇女的地位》、《闽西客家传统习俗》。调查报告也带有浓厚的理论色彩。

论文和调查报告都十分注意理论导向,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论文《妈祖研究的学术意义》发布于1990年在莆田召开的妈祖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站在宏观角度,讨论学习妈祖精神,强调多学科、多方位开展妈祖研究,以开拓学术领域;阐明妈祖研究与海上交通史、闽台关系史、华侨史研究的关系,富有指导意义。1996年,台湾举办妈祖信仰学术研讨会,立方同志提交论文《妈祖信仰与海洋文化》,从妈祖信仰与海洋文化关系的角度,讨论海洋事业、海洋文化的开拓、港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妈祖宫庙与海洋文化研究的关系,颇具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1999年,空海入闽1195周年纪念,他又撰写论文《弘扬空海潜心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的崇高精神》,文中盛赞空海热爱中国文化,排除万难来中国留学;回国后,根据所学,结合日本实际,在佛教日本化、创立日本文字,发展日本教育、书法、艺术等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文中还着重说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要总结中日两国人民互相学习、共同发展的正确方向与经验,使两国人民和谐相处、亲密无间、世代友好。论文落到“以史为鉴”内涵的实处,现实性较强。作者深入惠安大岵村调查,写了调查报告《大岵男女劳动分工及妇女的地位》,说明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讨论分析了当地存在的重男轻女现象,有现实意义。1993年9月,作者到闽西客家地区进行民俗田野调查,写出论文《白砂客家与官庄畬族在民间宗教信仰上的同和异》,通过调查上杭白砂客家与官庄畬族,对比客畬文化,提出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怎样认识客家和畬族的关系,客家文化与畬族文化的关系,如何弘扬

客家优秀文化。作者提出问题又回答问题,显示出社会调查的理性思考。

周立方同志重视闽台文化、民俗文化、地方文化的研究,重视闽台文化交流的作用,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两岸大岬人的妈祖信仰》等妈祖研究论文力图阐明妈祖信仰对闽台文化交流的意义和作用。在省民俗学会副会长任上,他就致力于把民俗研究和闽台文化交流联系起来,省民俗学会把妈祖研究作为与台、港、澳开展学术交流的突破口。《福州婚嫁习俗》是他访问福州市老一辈民俗学者和参考有关文章的成果,也是研究民俗的文章。1996年12月,省民俗学会和省社科联、台湾有关部门在厦大召开“玉皇文化研讨会”,立方又提交论文《论“玉皇”的自然神崇拜》,强调:“加强闽台民间信仰研究,包括‘玉皇’文化的研究与交流,对于增强两岸同胞手足情谊和文化认同,有着重大的意义”。他的论文《海峡两岸的吴真人崇拜》,着重揭示民间信仰和闽台文化交流的关系。这些文章极富地方色彩,充分体现出立方同志的理论研究组织工作与理论研究本身的成果。

立方同志是个实事求是的人,研究妈祖,就去考察湄洲祖庙;研究吴真人,就到闽南吴真人祖庙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玉皇”,就去参观草湖玉尊宫;研究“城隍”,就去考察清代福建“都城隍”分灵台湾各地的过程。他研究这些民间信仰的源流、发展和传播台湾的过程,力图弘扬民俗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促进两岸学者的学术交流。他的文章扎实、实在,努力呈现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而不满足于人云亦云和就事论事。

在与厦门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进行“惠东人研究”的学术交流时,除了认真调查研究、撰写文章,立方还努力组织其他学者写好文稿,并落实文集出版工作,使学术交流善始善终、成果显著。

与法国汉学家、福建社科院研究人员共同进行闽西客家文化调查时,立方已近70岁高龄,每年两个月,连续五年,开展调查研究,并写出多篇文章和调查报告,两次参加在香港召开的“国际客家学学术讨论会”。

立方同志在学术调研中认真执著、不畏辛劳、深入实际、求真务实,这种工作态度和工作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2006年7月26日于榕城

序二

陈育伦

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刹那,但在一个人的生命旅程中,却是不短的历程,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呀!周立方先生暮年之期仍矢志为国为民、尽责尽力,潜心八闽民俗文化的学术研究,十年间撰写了三十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又再一个十年之后,年近八十高龄的周先生,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永不言倦,精心整理十年前的研究成果,编辑成集,书名《福建十年民俗调查》。这一成果,对周先生个人来说,确实来之不易,故难忘也。对民俗学界来说,这是一部在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形成的富有创见的学术论著,在当前全国上下大力开展抢救和保护民间民族遗产的热潮中,更有着它的重要价值,故可贵也。

民俗文化是民间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人类的生活,从远古走到今天。从生命的诞生到结束,每个人都生活在流动的民俗文化中。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标志,是民族文化之根。

在中华民族民俗文化整体中,福建民俗文化的独特性、丰富性更为显著。古代中原汉人迁徙入闽之后,古老的中华民族民俗文化就在八闽大地生根繁衍,又与本地古闽越族的奇风异俗碰撞、融合。在福建的高山绿水间,奇特、美妙的民风、民习、民情尤其诱人。

福建省民俗学会于1989年成立,以调查、发掘、整理、研究福建各种民俗事象为己任。1990年,以“闽台婚俗”为中心议题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在三明市召开,邀请了多位台湾民俗学学者参加。会后,我省第一部民俗文化

专著《闽台婚俗》论文集出版,开启我省系统研究民俗文化之风。由于福建民俗文化与台湾民俗文化有特殊的渊源,研究福建民俗文化时自然而然也要涉及台湾民俗文化,台湾民俗文化与福建民俗文化可视为同处一个共同的民俗文化传播圈。长期以来,台湾民俗学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了闽台民俗文化的调查、整理和研究,自然促进了两岸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十多年来,省民俗学会组织了十多次全省性民俗学术研讨会,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从普遍的民俗事象(如闽台婚庆习俗、节庆习俗、礼仪习俗)到某些特定民俗事象(如两岸妈祖信仰、清水祖师信仰、吴真人信仰、陈靖姑信仰以及惠安民俗、侨乡民俗、客家民俗、谱牒文化),这些方面,大都有研究成果出版。

我和周立方先生相识相知,是在筹建和开展福建省民俗学会的工作中。周立方先生是省民俗学会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他积极参与了省民俗学会多项民俗文化调查、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在庆贺周立方先生《福建十年民俗调查》一书的出版,为我省民俗文化研究增添光彩之时,也不忘颂扬周立方先生在领导和推动我省民俗文化研究工作中做出的贡献。

2006年7月25日于厦门

序三

(法)劳格文

我和周立方先生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90年。当时,他来香港参加在中文大学召开的惠东人会议,而我正在该校的人类学系任教,为时一个学期。

我们交换了名片,就像平常人见面时所做的那样,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会面后来竟引出了我们不同寻常的合作。

当时,我仍然全身心地投入道教仪式的研究中。正如周先生所描述的那样,1991年我找到他时,提出了对陈靖姑和闾山教进行合作调查的想法。但是老天爷却另有主意——客家。“客家热”刚刚兴起,而且我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一浪潮中。这真是命中注定的好运气。

我的好运是双份的:因为它不仅揭开了一个全新的令人神往的领域,而且还使我有机会与一些非凡的人一起共事。

在这些朋友和合作者当中,周立方先生在我的心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他在序言中说我将他视同父辈。事实确实如此。每当我想起他以及我们共同分享的一切,总会被一种父子之情深深地打动。

而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周立方先生把我当成他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我永远不会忘记在1993年正月,我们在涂坊考察新年游灯时,我因发高烧病倒了。在乡间的旅舍里,他像慈母一样地照顾我,确定我身上已经盖了足够多的被子才放心。回县城之后,又悉心照料。

我也永远不会忘记,1995年,我们一起去调查伏虎禅师寺院周围十个村庄的信仰情况。我们首先于2月22日到达彭坊——一个离伏虎寺最近

的村子。那天,天气特别冷,雨下个不停,周立方先生虽然已年近七旬,却丝毫不退缩。一路上,我们都在为我在附近一个小村庄所遭遇到的尴尬事情——当时我深深地陷入了沼泽中那冰冷可咒的淤泥里——而大笑不止。

在此期间,我们还抽空到连城县亲历了一场盛大的“游公太”活动,3月5日,我们回到彭坊继续完成伏虎寺周边的研究。

这次我们从这十个村庄中最北边的一个开始,徒步行走于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最后回到了彭坊。晚上,我们在村子里的一个房屋落了脚,那里有空间房和一些被子。

3月11日清晨,我们准备出发去最后一个村庄——肖岭。我们有两个方案可以选择:第一个方案比较安全,先回到童坊,然后从那里等车上去;另一个则比较冒险,我们必须设法翻越一些低矮的山岭。

我们决定选择后者。当我们出发的时候,云很低沉但没有太多下雨的迹象。我们到达山脚下时候,开始下起了雨,但时断时续。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无法原路返回,我们只好上山。雨越下越大,接着就是瓢泼大雨,雨水在我们的脚边汇聚成了小溪。我担心周先生的心脏,便要求背他的包。他婉言接受了,于是我们继续前行,最后到达了童坊和连城之间的泥泞小路上。

现在该怎么办?当然是继续前进了。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听到了一阵轰鸣声,一辆平板卡车从童坊方向驶来。我们挥手示意卡车停下,爬上后车厢,同20个学生站在一起。那天是星期六,这些学生都是在周末乘车回家的。卡车顺路带了我们一段,在一座尼姑庵前停了下来。我们在尼姑庵里吃了一顿午饭,招待我们的是非常咸的面条。午餐后,老住持带着我们在路上拦了一辆当天的班车。在潮湿的阳光里,我们乘车一路来到了肖岭。

肖岭以它自己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作冒险。晚上开座谈会时,洪水就在屋子附近隆隆而过,我们要看的族谱先说是没有了,然后忽然出现,再过几分钟忽然又不见了。这天晚上我们就住在村长的家里。第二天上午我们搭车前往连城,在那里我们再次遇到了杨彦杰。

如果把我的整个旅程都写下来,那会占去太多篇幅。周先生是一个无可替代的伙伴,他给我留下的回忆是那样温馨,那样令人难以忘怀。他总是先想到别人,他教我练鹤翔气功,他有着让我至今仍感到惊讶的记录故事的

天赋。我们跟杨彦杰三人间分工，周立方先生的工作是记录故事和民俗。每天工作结束的时候，周先生就与我们分享他听到的故事。他以一种独有的平静方式讲述故事，其中又不失恰如其份的幽默和精彩。

但最令人难忘的是他记录故事的方式——一个小本子和一支自来水笔。好几次，我试图说服他用我们那个小的磁带机，而他真正只用过一次。当比较了两种方式的结果后，他坦言在他的手写笔记中确实漏记了几个细节。但事实是，他虽然写得并不快，但不知怎的，他还是成功地记下了整个故事，并保留了它原有的口头风味：它不仅仅是笔录，而且实际上与真实的记录是非常接近的。

本书的读者很难像我一样，有机会与周立方先生共同分享田野工作的乐趣与艰辛，但是读者们将会发现，周立方先生通过聆听、询问和记录学到了多少东西。他们将会有幸通过周先生的眼睛，看到一个即将逝去的社会。

2006年9月24日于法国巴黎郊区

Preface

I first met Zhou Lifang in 1990, when he came to Hong Kong to participate in a conference on Huidong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where I was teaching for a semester in the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We exchanged cards, as is the wont, but neither of us so much as dreamed that something unique was in the making.

At that time, I was still completely absorbed in my research on Taoist ritual and, when I went to see Mr. Zhou in 1991, as he describes in his preface, it was with the idea of organizing joint research on Chen Jinggu and Lüshan Taoism.

But Heaven had another idea: the Hakka. "Hakka fever" was just beginning, and we soon found ourselves swept along by a tidal force beyond our control. Such is the nature of good fortune.

My own good fortune in the matter was double: the opening up of a whole new and fascinating field an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extraordinary people.

Among these friends and collaborators, a very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belongs to Zhou Lifang. He says in his preface that I treated him like a father, and no doubt that is so for when I think of him and all we shared, I am moved by filial feelings.

But if it is so, it is because Zhou Lifang treated me like a son. I will never forget how, in January 1993, when we were in Tufang for the New Year's lantern parade and I fell sick with a high fever, he watched over me like a mother in the country hostel, making sure I had enough blankets, and then getting me back to the county seat for treatment.

Nor will I ever forget the research we did together on the ten-village worship circuit of the Chan monk Fuhu in 1995. We went first on February 22 to Pengfang, the village nearest Fuhu's temple. It was bitterly cold and often rained, but Zhou Lifang, about to turn 70, never flinched, and we still laugh about how, during our visit to a nearby hamlet, I sank knee deep into a morass of chilly duck-shit laden mud.

On March 5, after an interlude in Liancheng County to witness the massive parade of Gongtai, we came back to finish our study of the Fuhu circuit.

This time we started at the northernmost village of the ten and walked our way from village to village, back to Pengfang.

At night, we stayed in whatever house in the village had an extra room and some blankets.

On the morning of March 11, we prepared to go to the last village, Xiaoling, but were undecided whether to do it the safe way, go back to Tongfang and wait for the bus, or be adventurous and strike out over the low mountains?

We decided to do the latter. When we set out, the sky was low but hardly threatening. By the time we reached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it had begun to rain, but the drops were still occasional, and we had in any case gone too far to turn back.

So we began the climb. Soon it was raining hard, then pouring, and the rain ran in rivulets around our feet.

I began to worry about Zhou's heart and asked him to let me carry his

bag. He kindly consented, and we marched on, emerging at last onto the dirt road that links Tongfang to Liancheng.

Now what? -continue walking, of course! But not too long after, we heard a rumbling sound and saw a flatbed truck coming up from Tongfang.

We hailed it, it stopped, and we climbed in the back along with some twenty schoolchildren going home for the weekend (it was Saturday).

They dropped us off a bit down the road at a nunnery, where we had a lunch of very salty noodles.

After lunch, the old abbess took us out to the road to catch the one bus of the day, and it drove us through the humid sun down to Xiaoling.

Xiaoling was to prove an adventure in its own right, with an evening meeting in a house next to a roaring torrent and lineage registers that suddenly materialized and then just as suddenly were spirited away. That night we slept in the village head's house, and the next morning we caught a bus to Liancheng, where we met up again with Yang Yanjie.

Were I to recount all our adventures, it would take many pages. What remains of them are the warm memories of a companion without peer, who always thought of others first, who taught me the *hexiang* form of Qigong, and who had a gift for recording tales that still fills me with amazement. For with Yang Yanjie the three of us had worked out a division of labor in which Zhou Lifang's role was to record tales and customs. At the end of every day, Zhou would regale us with the stories he had heard. He told them in his quiet way, with just the right touch of humor and wonder. But even more unforgettable was how he recorded the tales, with a small pad and a fountain pen. Many times I tried to convince him to use our little tape recorder, and one time he actually did. When he compared the result, he generously said that he had indeed missed a couple of details in his handwritten record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was

that, even though he hardly wrote quickly, he somehow managed to get the whole story down and preserve its oral flavor: it was not just notes, it was really very close to an actual recording.

Readers of these pages will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I did of sharing with Zhou Lifang the joys and anxieties of fieldwork. But they will discover how much he was learning as he listened, questioned, and wrote, and they will have the privilege of seeing through his eyes a society that is now nearly gone.

John-Lagerwey

Fontenay-sous-Bois, France, September 24, 2006

自序

我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的一些文章和调查报告,选编成一个集子,取名为《福建十年民俗调查》。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致力于研究与探索福建地方民俗文化。

我于1990年离休。在工作岗位上的四十多个春秋,都是从事宣传教育、行政工作,当干事、秘书,主持县宣传、文教部门和地区报社的工作,1956年以后,更是在省委党校和宣传部门直接从事理论教育工作。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十年左右时间,我却集中力量从事地方民俗和民间信仰等传统习俗方面的研究,写了几十篇这方面的文章,收集在这个集子里的便是其中的大部分。我一向从事理论宣传教育工作,为什么离休后会研究起妈祖、保生大帝、临水夫人以及玉皇、城隍等神明来的呢?这要从当时海峡两岸的形势说起。

1987年前后,在隔绝近四十年之后,两岸人民在经贸、文化及学术等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台湾同胞纷纷回大陆探亲访祖,学术界面临着与台、港、澳及海外学者全面开展学术交流的崭新任务。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在厦门大学的同窗老友陈国强,当时是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人类学系主任,有一次来福州参加学术会议,诚恳而又亲切地对我说:“你一辈子为行政事务奔忙,现在快离休了,何不也来和我们一起做些学术研究工作,为与台、港、澳学术交流做些贡献!”他的这个想法也正适合我的意愿和志趣。此后不久,他就以厦门大学为基地,筹组成立了

省民俗学会,并在成立会上,推选我为副会长(他当选为会长)。民俗学我并不熟悉,既然是老友和同志们的盛情推荐,我也只好顺水推舟,承担下任务,边做边学。

当时,省民俗学会把妈祖研究作为与台、港、澳开展学术交流的突破口。妈祖在台湾有广泛的信众,庙宇林立。在此之前,海峡两岸同时兴起妈祖热,台湾民众多次冲破台湾当局的禁令和封锁,渡海到湄洲妈祖祖庙朝拜,内地到湄洲观光朝拜的也络绎不绝。与此同时,妈祖故乡莆田市也曾多次邀请省内外学者参加纪念妈祖的学术讨论会,成立了妈祖研究会,有关妈祖的书籍和画册亦陆续问世。为适应海内外朝圣者了解妈祖信仰起源发展与祖庙沿革的需要,陈国强带领学会同志,配合莆田当地学者,多次到湄洲考察研究,组织编写了《妈祖信仰与祖庙》一书,书中《妈祖生平事迹的传说》这篇文章便是我在妈祖研究方面的第一篇文章。1990年4月,学会诸同志又参加了在莆田市召开的纪念妈祖诞辰1030周年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个会议得到台湾北港朝天宫的赞助和支持,到会的不仅有台湾和香港的学者,还有美国、日本和韩国等的外国学者。《妈祖研究的学术意义》一文就是 I 我参加这次会议的论文。此后我曾被推选担任湄洲妈祖研究会副会长。1995年4月,我和福建社科院研究员徐晓望同志受澳门文化研究会的邀请,参加了在澳门召开的“妈祖信仰历史文化研讨会”;1996年8月,受台湾北港朝天宫的邀请,我和厦门大学朱天顺教授、福建师大徐恭生教授以及福建新华社、省电视台的几位同志,参加了在台湾北港召开的妈祖信仰学术研讨会。这两次学术会议规模很大,会议规格都相当高,海外学者众多,涉及妈祖文化的内容范围也很广,会后都有专门的论文集问世。《妈祖传说研究》和《妈祖信仰与海洋文化》两文,便是我为参加这两次国际学术会而撰写的。

福州、莆田一带掀起妈祖研究热潮的同时,在闽南,以厦门大学历史系罗耀九教授等一批同志为主体,配合白礁、青礁两座保生大帝(吴真人)祖庙的董事会,多次盛情款待了台湾保生大帝联谊会的代表、会长周大围、李炳南教授等人,召开了几次纪念吴真人的学术讨论会和座谈会。周大围、李炳南等还多次组织上百人的参观团到厦门和龙海拜谒保生大帝祖庙,组团到福州、杭州、上海等地参观,台湾同胞追根认祖和热爱祖国河山的深厚情感